

机遇固然不能错失，但面对诱惑时的冷静和克制，才是一个领导者必须具备的可贵品质，这也是为了更好地担当。

“全球化领导者”的喧嚣

文 | 本刊特约撰稿人 赵义

最近有两件几乎同时发生的大事，对于经济全球化正在发生深刻逆转的当今世界来说，是非常具有象征意义的。

一件是“局外人”特朗普正式就任美国总统。这位至今仍让太多人难以接受的美国新总统，在就职演讲中，毫不掩饰地喊出从现在开始要“美国第一”，对经济全球化充满了可以说切齿的痛恨，似乎全球化就是美国现在所有社会问题的罪魁祸首：

“几十年来，我们以美国工业的衰落为代价为别国的工业输送营养，为别国军队施以援助，但对我国军力的耗损视而不见。

“我们曾经致力于保卫其他国家的领地，却

忽略了我们自己的领土。

“我们曾经将成千上万亿美元转移到海外，我们自己的基础设施却年久失修、长年荒废。

“我们帮助其他国家走上了富裕之路，我们自己的财富、力量和自信却逐渐消失在地平线上。我们的工厂一个接一个倒闭，而我们成千上万落在后面的工人被长久忽视。

“我们中产阶级的财富被剥削，再分配给世界其他国家。……”

而另一件大事则是中国以高规格去瑞士达沃斯参加2017年世界经济论坛年会，国家主席习近平亲自前往。对比之下，即使不是因为正式就职，特朗普料想也不会来参加，而达沃斯的常客、德国总理默克尔，被德国国内和欧洲的各种烦事搞得焦头烂额，分身无术，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因为陷入了全球化带来的问题的政治泥潭，不得不在几百公里以外的柏林遥望达沃斯。

习近平亲自前往，是大有深意的。在全球化逆转之势愈演愈烈的情况下，整个世界都迫切需要听到中国声音和中国方案。习近平在论坛开幕式的演讲中鲜明地亮出了中国对全球化的主张：经济全球化确实带来了新问题，但我们不能就此把经济全球化一棍子打死，而是要适应和引导好经济全球化，消解经济全球化的负面影响，让它更好惠及每个国家、每个民族。

在中国看来，世界经济长期低迷，贫富差距、南北差距问题更加突出，究其根源，是经济领域三大突出矛盾没有得到有效解决：一是全球增长动能不足，难以支撑世界经济持续稳定增长；二是全球经济治理滞后，难以适应世界经济新变化；三是全球发展失衡，难以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期待。这些问题反映出，当今世界经济增长、治理、发展模式存在必须解决的问题。

看了习近平演讲的人们想必都能从话语中体味到，这个演讲不仅仅讲出中国主张，也时时处

处都有与美国以及新任总统特朗普“隔空对话”的意思。读一读演讲中的这些段落，这一点就看得很清楚：

“搞保护主义如同把自己关进黑屋子，看似躲过了风吹雨打，但也隔绝了阳光和空气。打贸易战的结果只能是两败俱伤。

“条条大路通罗马。谁都不应该把自己的发展道路定为一尊，更不应该把自己的发展道路强加于人。

“要践行承诺、遵守规则，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取舍或选择。《巴黎协定》符合全球发展大方向，成果来之不易，应该共同坚守，不能轻言放弃。

“中国人民不会犯‘红眼病’，不会抱怨他人从中国发展中得到了巨大机遇和丰厚回报，中国人民张开双臂欢迎各国人民搭乘中国发展的‘快车’、‘便车’。……”

这种“隔空对话”看上去是针锋相对，也是客观情势使然。中国要扮演何种角色，这个问题至关重要，因为正如特朗普正式就任美国总统这个事件表明的，最近一波全球化的领导者已经准备放弃或者部分放弃自己的领导责任。对任何一种世界政治和经济体系而言，恐怕没有什么比领导者的变迁冲击更大的事情了。在接下来的全球化进程中，世界各国更迫切地需要了解中国对自己的角色的认知。

很多人会对这个变迁高声欢呼，认为中国的机会来了，呼唤中国担当经济全球化领导者责任的声音越来越高涨。中国的机会是来了，这个是客观事实，不过，越是这个时候，反而越是需要冷静。

这也让我想起中国三国时代英雄人物刘备说过的一段话，他在总结自己成功之道时说：“操以急，我以缓；操以暴，我以仁；凡每每与之相反，遂能如愿也。”曹操是三国时代实力最大的一方，势单力弱的挑战者刘备选择了

“每每与之相反”的策略，遂成就了鼎足而立的霸业。在今天的全球化时代，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也的确有与第一大经济体美国“与之相反”的一面，但要真的取而代之，光“与之相反”是不够的。领导者定位的形成，不仅是实力有了就自然而然会有，还需要艰苦的“建构”工作。

至少有三个问题，需要我们在面对各种喧嚣的时候，深入思考并给出答案的。

全球化的领导者，也必然要为全球政治经济秩序提供公共品。“美国第一”意味着美国不想或者不想再单独承担这些公共品的提供。我们在研究一些发展模式的时候（比如北欧模式），往往忽略了国际政治经济秩序这个公共物品的背景。中国要填补美国的空白，那对中国自己的政治经济力量的配置会带来深刻影响。

最近这波全球化出现波折，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收入分配不平等、发展空间不平衡，长期在“正确”话语中被压抑，似乎是突然冒出来一样的人们开始发出自己的声音。但请注意的是，中国自己也是世界上贫富差距比较大的国家，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形成一套成熟完善的缩小贫富差距，包括减少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对就业冲击的机制。

最重要的是，从英国和美国分别担当全球化领导者的历史来看，它们不仅有一套成熟的关于全球化的“意识形态”，并且有强大的从国家到企业到社会组织的行动能力，即具有强大的把“意识形态”落地的领导力。从现实看，无论是从我们的公共治理水平，还是企业的公司治理水平，或者社会组织的专业化水平（比如扶贫），都不能说已经形成了一套成熟有效的“中国方案”。

所以，面对“全球化领导者”的喧嚣，我们一定要冷静。机遇固然不能错失，但面对诱惑时的冷静和克制，才是一个领导者也必须具备的可贵品质，这也是为了更好地担当。■